

数字经济发展与企业战略差异度

盛明泉, 项春艳

(安徽财经大学 会计学院, 安徽 蚌埠 233030)

摘要:将数字经济与企业战略差异度置于同一框架,从企业外部环境与自身能力出发,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如何影响企业战略差异度。选取 2011—2020 沪深 A 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战略差异度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企业战略差异度越大;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激发行业间激烈竞争增强企业风险承担能力,促使企业战略差异度上升。进一步研究显示,环境不确定性与冗余资源均对数字经济与企业战略差异度之间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数字经济对东部地区企业战略差异度的促进作用更强。未来企业可以将业务等模块与互联网经济相结合,促进企业实现跨界经营,但企业在实施战略调整的过程中,也需要注意环境不确定性与企业冗余资源情况。政府层面则应发挥“有为政府”作用,利用财政资金加快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创造良好设施基础,同时充分发挥政府的“有形之手”作用,强化监督管控。

关键词:数字经济;战略差异度;行业市场竞争;企业风险承担

中图分类号:F49;F27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99(2023)03-0057-11

一、引言

在我国提升信息化建设的环境背景下,数字经济不断渗透到生产生活领域,已成为我国创新发展的重要力量和经济发展中最为活跃的领域。在与社会各领域不断融合的过程中,数字经济对社会就业、拉动投资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1]65}。与此同时,数字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也日益凸显。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相关资料显示,2020 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 39.2 万亿元,已成为世界第二大数字经济国。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兴起,数字经济进一步得到技术支持,网上办公、线上消费等新型业务模式应运而生^[2]。面对迅速变化的大环境,企业发展与方向选择必然遇到新问题与新挑战,唯有不断进行战略调整才能寻求出路,^[3]科学的战略规划有助于企业进行创造性行为、保持竞争力并有效适应外部环境变化。企业成长过程本就是企业战略不断变化的过程,长期不变的发展战略对于企业发展百害而无一利,稳中求进的战略方能让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由此,关于企业战略的研究一直备受学术界与实务界广泛关注。

目前,关于数字经济和企业战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上,赵涛等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有所创新,提出从互联网发展和数字普惠金融两方面对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进行测度。^{[1]70}刘军等从信息化发展、互联网发展和数字交易发展三个维度对我国各省份数字经济指标进行测度,分析发现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与两极分化现象,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于中西部地区。^{[4]81}对于企业战略的研究大多关注内部因素,较少注意到外部因素对企业战略行为的影响。具体而言,内部因素主要包含管理层特征以及企业特征,如高管薪酬、CEO 人格特征等。董静等基于行为代理理论研究发现,CEO 超额薪酬与企业战略偏离行业集中或主流趋势存在倒 U 型关系;^[5]盛宇华

收稿日期:2022-03-14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AHSK2021D25)

作者简介:盛明泉(1964—),男,安徽财经大学会计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兼),公司治理与资本效率研究院院长。

和朱赛林从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视角探究独立董事对战略差异的影响,结果显示独立董事对企业战略差异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社会资本与企业战略差异具有倒U型关系;^[6]韵江等从“韧性效应”和“创造效应”视角分析了CEO过度自信对企业战略变革的影响^[7]。为数不多的外部因素分析主要从媒体、制度与分析师角度展开,探究其对企业战略行为的影响。Bednar等研究发现媒体负面报道会加速企业战略调整;^[8]Yang等探究了货币政策对企业战略行为的影响,发现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利于企业调整战略;^[9]王霞和叶彤彤认为,当今社会制度环境的变化是企业进行战略转换的主要推动力^[10]。立足数字经济背景探究其对企业战略调整的影响,这一研究仍较为缺乏,关于数字经济是否会影响企业战略行为?如果两者存在关联性,数字经济对企业战略的作用机制又如何?尚无深入的理论分析。综上,本文将进一步探讨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战略行为的影响,一方面,丰富数字经济的相关研究,另一方面,可有助于企业找出影响自身发展的内外部因素,继而高效整合内外部资源、提高利用效率,加速创新发展。

相比较既有研究,本文的边际贡献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拓宽了数字经济的研究视角。现有研究大多探究数字经济对区域生产率、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对微观企业的关注相对较少。本文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战略差异度的影响,拓展了数字经济对微观企业的影响研究。第二,从微观层面揭示数字经济的社会影响。将数字经济与企业战略差异度置于同一框架,从企业外部环境与自身能力出发,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如何影响企业战略差异度,更为深入地揭示了两者之间的作用机制。第三,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企业现代管理经验。在互联网新技术不断崛起的数字时代,数字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释放创新效能、提升技术创新速率、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探究数字经济对企业战略差异度的影响,对于数字经济发展和企业创新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数字经济与企业战略差异度

数字经济时代的崛起使得企业内外部环境均发生了巨大变化,数字要素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战略数字化转型成为必然趋势^[11]。这是因为,第一,数字技术的应用可以提高信息共享能力,带动企业内外部资源整合与重新配置,保持组织与环境的适配性,从而形成“创造效应”,引导企业转变发展方式^[12]。第二,战略调整的首要触发因素就是环境变化。面对数字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新要求、新机会以及新型竞争环境,传统战略规划与环境的适配性较差,经营效率也会随之降低。因此,企业需要基于数字化能力构建新发展模式来保持自身市场竞争优势。第三,数字经济将更有利于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一方面,企业可以依托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建设网络创新平台,降低研发成本、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另一方面,数字经济有效提高了创新成果与现实需求间的匹配程度,可降低创新风险、调动企业创新积极性。总而言之,实施创新的企业可通过战略定位调整、思维视野拓展等在产品、市场等方面变革突破,通过提升产品品质、降低运营成本形成新市场或新业态。即数字经济时代,面对巨大的外部环境变化,创新是企业战略调整的重要推动力。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战略差异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二)作用机制分析

1. 数字经济、行业市场竞争与企业战略差异度

数字经济发展将加剧行业市场竞争度。依托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所形成的数据分析能力以及资源分配能力,有助于企业突破行业壁垒进行跨界运营发展,这使得企业降低成本并提升自身竞争力。数字信息时代给消费市场带来巨大变化,消费市场变化的同时也将引发生产活动进行相应调整。更具体地说,在数字信息作为影响利润与价值的关键生产要素的时代背景下,企业将更趋向于实施具有竞争力的模块化生产,生产活动被分解为更细致的分工操作,产业链细化与增长达到一定高度。而在细分的差异性产品市场,市场结构可能处于垄断状态,行业市场竞争也因此更激烈,而行业市场竞争加剧将促进企业

战略差异度上升。这主要在于,从公司治理角度来说,产品市场竞争激烈时可以改善工作中管理者偷懒现象。在强大的竞争压力下,管理者会对企业经营更加负责、认真,继而强化企业战略调整动力,反之则动力不足。陈胜蓝等的研究还发现,当企业处于不利发展环境时,会提高现金捐赠水平来巩固长远效益^[13]。刘志彪等指出处于激烈竞争环境时,企业负债率会同步上升,且管理者会想方设法地从各方面加以改善调整以提升自身竞争优势^[14],如降低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等。综上所述,产品市场竞争程度会影响企业资源配置,进而影响企业战略差异度。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2:数字经济发展将加剧行业市场竞争,进而影响企业战略差异度。

2. 数字经济、风险承担能力与企业战略差异度

作为数字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金融科技,对于企业而言是一种替代性融资方式,能够以低成本向企业提供更加便捷的融资渠道,促使企业资金来源多元化。资金来源的多元化会相应降低融资成本并提升投资收益,可使企业在进行风险项目投资时更具主动性和偏好性。数字经济发展所依托的互联网信息技术运用于企业,可有效吸引外部资源和积累企业内部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同时优化人力资源与知识资源的有效配置,进而为企业创新提供资源支持。企业创新活动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风险活动,^[15]也意味着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有所提高,而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高将促进企业战略差异度上升。这主要在于,从动态能力视角来看,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越高,风险承受能力越强,企业对高风险、高收益投资项目就更具偏好性,企业现存资源配置方式得以改善,继而增加企业价值。同时,企业对风险承受能力越强则越可承受战略调整后果,有利于企业进行多元化选择。从机会识别视角来看,企业风险承担能力越高,管理层越可有效识别并把握投资机会,增加创新项目投入,促进企业战略调整。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3:数字经济通过提高企业风险承担能力,进而影响企业战略差异度。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 2011—2020 年我国沪深 A 股市场的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对数据进行如下处理:删除 ST 与金融类样本;剔除基础数据缺失,或基本指标存在明显偏误的样本,在此基础上为了消除极端值的影响,对主要连续变量 1% 以下和 99% 以上进行 Winsorize 处理。本文变量所涉及的公司数据来源于 CSMAR(国泰安)数据库,数字经济指数构建数据来自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此外通过各省市官方统计局发布的信息对数据进行补充,其中数字金融发展采用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该指数由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和蚂蚁金服集团共同编制^[16]。本研究使用 stata15.0 进行数据分析。

(二)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战略差异度(SC)。借鉴以往研究,^[17,18]使用公司在四个关键领域资源分配情况的年度区间波动性来界定企业战略差异度。四个测评维度分别为:非生产费用率(管理费用/营业收入)、存货收入比(存货/营业收入)、财务杠杆(负债/所有者权益)以及固定资产更新程度(固定资产净值/固定资产总值)。本文先计算各维度在 t 年和第 $t-1$ 年之间的差额并取绝对值,再将其标准化且剔除行业效应,最后将各维度指标取平均值得到企业战略差异度。此外,在稳健性检验部分本文构建六维战略差异度指数进行稳健性检验。

2. 解释变量

本文的解释变量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Dige)。借鉴赵涛等、刘军等和黄群慧等的做法,^{[1]69[4]96[19]5} 本文构建城市层面数字经济指数,从互联网发展与数字普惠金融两方面对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同时,从以下四个方面对互联网发展水平进行测度:互联网普及率、移动电话普及率、相关人员从业和产出情况,分别用以下指标表示:百人中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人员占城镇

单位从业人员比重、人均电信业务总量和百人中移动电话用户数。对于金融发展采用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之后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对标准化后的数据进行降维处理,得到数字经济综合指标。

3. 中介变量

本文中介变量为行业市场竞争和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其中,行业市场竞争采取行业勒纳指数(Pcm)衡量:

$$Pcm = \sum(\text{单个企业营业收入} / \text{行业内营业收入合计} \times X), \tag{1}$$

$$X = (\text{营业收入} - \text{营业成本} - \text{销售费用} - \text{管理费用}) / \text{营业收入}, \tag{2}$$

Pcm 越小表明行业市场竞争越激烈。

企业风险承担能力(Risk),本文参考以往研究,^[20]首先,计算公司资产回报率与行业均值的差额,对制造业样本分类细化到两位代码,再以三年为一个观测期,滚动计算经过行业调整后的标准差;其次,参考宋建波等的研究,将计算结果乘以 100 得到企业风险承担能力指标^[21]。

4. 控制变量

本文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战略差异度的影响,为提高控制变量选取合理性,除选取微观企业层面控制变量之外,还需选取宏观层面控制变量。因此,本文从外部环境、公司特征与内部治理三方面选取相关的控制变量。参考赵涛等的做法,^{[1]70}选取金融发展程度(Finance)、对外开放程度(Fdi)作为宏观层面的控制变量,即外部环境方面。参考杜善重和李卓的做法,^[22]选取公司特征变量和内部治理变量作为微观层面的控制变量。其中,公司特征变量包括:企业规模(Size)、企业资产负债率(Lev)、企业成长性(Grow)、企业年龄(Age);内部治理变量包括:董事会规模(Board)、独立董事比例(Idpro)、两职合一(Dual)、股权集中度(Top1)、管理层持股(Mgshare)。同时还控制了年度(Year)与行业(Ind)。各变量的具体定义见表 1。

表 1 变量定义

变量分类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描述
被解释变量	战略差异度	SC	四维战略指标进行测算
解释变量	数字经济	Dige	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指数
中介变量	行业市场竞争	Pcm	行业勒纳指数
	企业风险承担	Risk	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指标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Size	企业总资产取对数
	资产负债率	Lev	总负债/总资产
	独立董事比例	Idpro	独立董事人数/董事会人数
	董事会规模	Board	董事会人数
	企业年龄	Age	企业成立年限
	两职合一	Dual	若董事长与总经理为同一人则取值为 1,否则为 0
	股权集中度	Top1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企业成长性	Growth	营业收入增长率
	管理层持股	Mgshare	管理层持股数取对数
	金融发展程度	Finance	城市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地区生产总值
对外开放程度	Fdi	城市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地区生产总值	

(三)实证模型

结合以往相关研究以及本文研究目的,考虑到模型合理性,进行豪斯曼检验,结果显示拒绝原假设,

故采用固定效应模型(限于文章篇幅不在此详细列示,若有需要可联系作者获取),构建以下基准模型:

$$SC_{it} = \alpha_0 + \alpha_1 Dige_{ct} + \beta X_{ct} + \gamma E_{it} + \mu_t + \mu_i + \epsilon_{it}, \quad (3)$$

其中, SC_{it} 为企业 i 在 t 年的战略差异度指数, $Dige_{ct}$ 为企业 i 所在的城市 c 在 t 年的数字经济指数, X_{ct} 为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 E_{it} 为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 μ_t 和 μ_i 分别为年份固定效应和行业固定效应, ϵ_{it} 为误差项。

为进一步探究行业市场竞争、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对数字经济发展与企业战略差异度之间关系的中介作用,借鉴温忠麟和叶宝娟所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进行检验,^[23]构建如下模型:

$$\begin{aligned} SC_{it} &= \alpha_1 + \varphi_1 Dige_{ct} + \beta_1 X_{ct} + \gamma_1 E_{it} + \mu_t + \mu_i + \epsilon_{it}, \\ M_{it} &= \alpha_2 + \varphi_2 Dige_{ct} + \beta_2 X_{ct} + \gamma_2 E_{it} + \mu_t + \mu_i + \epsilon_{it}, \\ SC_{it} &= \alpha_3 + \varphi_3 Dige_{ct} + \beta_3 X_{ct} + \omega M_{it} + \gamma_3 E_{it} + \mu_t + \mu_i + \epsilon_{it}, \end{aligned} \quad (4)$$

其中, M_{it} 为中介变量,对应本文中行业市场竞争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 2 列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 2 中可以看出本文所计算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平均数与中位数分别为 3.293、2.587,企业战略差异度平均数与中位数分别为 0.223、0.135。表明二者都呈右偏分布的特征(均值 > 中位数),且都呈现均值小、标准误大的特点。企业战略差异度最大值为 2.136,最小值为 0.016,表明企业间战略差异度水平差异较大。数字经济指数最大值为 15.65,最小值为 -1.242,均值为 3.293,符合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实情况。其他控制变量总体上来看分布合理,与现有文献也保持较高一致性。

表 2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	样本量	平均值	中位数	最小值	最大值	标准差
SC	10 829	0.223	0.135	0.016	2.136	0.290
Dige	10 829	3.293	2.587	-1.242	15.65	3.297
Pcm	10 829	0.117	0.106	-0.224	0.504	0.071
Risk	9 808	0.046	0.021	0.002	0.405	0.072
Size	10 829	22.25	22.06	19.89	26.46	1.316
Lev	10 829	0.413	0.402	0.050	0.904	0.206
Idpro	10 829	0.376	0.364	0.333	0.571	0.054
Board	10 829	8.538	9	5	15	1.690
Age	10 829	17.04	17	4	30	5.636
Dual	10 829	0.299	0	0	1	0.458
Top1	10 829	33.02	30.83	8.480	75.10	14.33
Growth	10 829	0.190	0.116	-0.570	3.252	0.447
Mgshare	10 829	15.47	16.79	6.908	20.49	3.635
Finance	10 829	4.483	4.692	1.297	8.661	1.795
Fdi	10 829	0.005	0.004	0	0.017	0.003

(二)实证结果分析

表 3 报告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战略差异度的影响结果。其中,第 1 列为没有加入任何控制变量以及没有控制年份、行业效应的回归结果;第 2 列为只加入控制变量,没有控制年份、行业效应的回归结果;第 3 列为加入控制变量以及控制年份、行业效应后的回归结果。从表 3 的结果可以看出,无论是否加入

控制变量或者控制年份、行业效应,回归结果显示数字经济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同时,对比列1与列3,调整后的 R^2 由0.0012增加到0.1425,表明模型设置的合理性进一步得到验证。列3中数字经济发展系数为0.0086,且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正向影响企业战略差异度,假设1得到验证。

表4为行业市场竞争作用于企业战略差异度的检验结果统计。表4第2列显示数字经济系数为-0.0008,且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数字经济发展加剧了行业间市场竞争。第3列显示将数字经济、行业市场竞争与战略差异度纳入同一研究模型中,则行业市场竞争的系数为-0.4914,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行业市场竞争越激烈,企业战略差异度越大。上述的检验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证明“数字经济—行业市场竞争—战略差异度”这条影响路径是存在的,本文假设2得到证实。面对激烈的竞争,企业只有随着行业环境变化不断调整战略规划,方能实现稳健存续和可持续发展。

表3 数字经济与企业战略差异度关系分析

变量	(1) SC	(2) SC	(3) SC
<i>Dige</i>	0.0088*** (3.26)	0.0096*** (3.79)	0.0086*** (2.83)
<i>Size</i>		-0.0652*** (-4.34)	-0.0627*** (-7.58)
<i>Lev</i>		0.3920*** (6.57)	0.3805*** (12.54)
<i>Idpro</i>		-0.0502 (-0.44)	-0.0071 (-0.07)
<i>Board</i>		-0.0022 (-0.46)	0.0001 (0.03)
<i>Age</i>		0.0028 (1.15)	-0.0370*** (-2.65)
<i>Dual</i>		-0.0027 (-0.23)	-0.0043 (-0.46)
<i>Top1</i>		-0.0006 (-0.88)	-0.0012** (-2.10)
<i>Growth</i>		0.1033*** (8.92)	0.1032*** (16.50)
<i>Mgshare</i>		-0.0058* (-1.85)	-0.0063*** (-2.87)
<i>Finance</i>		-0.0068** (-2.21)	0.0080** (2.19)
<i>Fdi</i>		-2.6693 (-1.26)	-3.5456** (-2.27)
行业	No	No	Yes
年份	No	No	Yes
<i>_cons</i>	0.1941*** (21.88)	1.6053*** (5.29)	1.6050*** (5.41)
<i>N</i>	10829	10829	10829
<i>Adj. R²</i>	0.0012	0.0547	0.1425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值,下同。

表4 行业市场竞争作用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1) SC	(2) <i>Pcm</i>	(3) SC
<i>Dige</i>	0.0086*** (2.83)	-0.0008** (-2.41)	0.0082*** (2.64)
<i>Pcm</i>			-0.4914*** (-4.16)
<i>Size</i>	-0.0627*** (-7.58)	0.0024*** (2.61)	-0.0615*** (-4.25)
<i>Lev</i>	0.3805*** (12.54)	-0.0060* (-1.75)	0.3776*** (6.50)
<i>Idpro</i>	-0.0071 (-0.07)	0.0119 (1.09)	-0.0012 (-0.01)
<i>Board</i>	0.0001 (0.03)	-0.0002 (-0.56)	-0.0000 (-0.00)
<i>Age</i>	-0.0370*** (-2.65)	0.0004 (0.24)	-0.0369 (-0.89)
<i>Dual</i>	-0.0043 (-0.46)	-0.0000 (-0.01)	-0.0043 (-0.38)
<i>Top1</i>	-0.0012** (-2.10)	-0.0000 (-0.20)	-0.0012* (-1.70)
<i>Growth</i>	0.1032*** (16.50)	0.0031*** (4.33)	0.1047*** (8.98)
<i>Mgshare</i>	-0.0063*** (-2.87)	-0.0002 (-0.74)	-0.0064** (-2.17)
<i>Finance</i>	0.0080** (2.19)	0.0006 (1.50)	0.0083** (2.49)
<i>Fdi</i>	-3.5456** (-2.27)	0.2093 (1.18)	-3.4427* (-1.67)
行业	Yes	Yes	Yes
年份	Yes	Yes	Yes
<i>_cons</i>	1.6050*** (5.41)	-0.0068 (-0.20)	1.6017*** (2.60)
<i>N</i>	10829	10829	10829
<i>Adj. R²</i>	0.1425	0.3306	0.1452

表 5 为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作用机制检验结果,第 2 列显示数字经济系数为 0.003 2,且在 1%水平上显著,说明数字经济发展提高了企业风险承担能力。第 3 列显示将数字经济、企业风险承担能力与战略差异度纳入同一研究模型中,则企业风险承担能力的系数为 0.216 0,且在 1%水平上显著,说明企业风险承担能力越强,企业战略差异度越大。上述检验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证明“数字经济—企业风险承担能力—战略差异度”这条影响路径是存在的,本文假设 3 得到证实。由于企业战略调整伴随一定的风险性,企业风险承担能力上升,可以促进企业调整战略。

(三) 稳健性检验

1. 增加控制变量

本文借鉴盛明泉等的做法,^[24]增加控制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增加以下控制变量重新进行回归分析:有形资产占比(Tang),采用企业固定资产除以企业总资产;人口规模(Popu),采用城市人口数量取对数;科技教育投入(Scedu),采用地区科技教育投入占 GDP 比重为代理变量。表 6 第 1 列结果显示数字经济与企业战略差异度的回归系数为 0.009 5,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结果稳健。

2. 替代测量

考虑到本文单一的变量测算方法所获得的相关结果可能具有偶然性与存在误差,因此,本文采用更换被解释变量的计算方法,对企业战略差异度采用六维指标(Sc)进行测度,增加广告强度与研发强度两个战略维度。结果如表 6 列 2 所示,数字经济与企业战略差异度系数为 0.008 2,且在 1%水平上显著,支持本文既有结论。

3. 工具变量法

由于本文可能存在反向因果以及遗漏变量问题,尝试用工具变量法缓解其内生性问题。本文借鉴黄群慧等的做法,^{[19]17}选取 1984 年各城市层面固定电话数量和邮局数量并取对数,来作为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工具变量,随后用工具变量法对基准模型重新进行估计。由于选取的工具变量为横截面数据,不能直接用于面板数据分析,参考 Nunn 和 Qian 所运用的方法,^[25]将上述选取的工具变量与上一年全国互联网用户数(随时间变化)交乘,构造数字经济发展工具变量。表 6 第 3 列为第一阶段结果,数字经济工具

表 5 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作用机制检验

变量	(1)	(2)	(3)
	SC	Risk	SC
<i>Dige</i>	0.007 6** (1.99)	0.003 2*** (2.87)	0.007 4* (1.84)
<i>Risk</i>			0.216 0*** (4.32)
<i>Size</i>	-0.045 4*** (-2.60)	-0.003 3 (-0.70)	-0.044 5*** (-4.81)
<i>Lev</i>	0.399 7*** (5.76)	0.055 0*** (3.80)	0.387 8*** (11.41)
<i>Idpro</i>	0.004 1 (0.04)	-0.006 2 (-0.17)	0.004 5 (0.04)
<i>Board</i>	0.001 0 (0.18)	0.000 4 (0.26)	0.000 9 (0.21)
<i>Age</i>	-0.032 1 (-1.17)	-0.010 3* (-1.65)	-0.030 0* (-1.89)
<i>Dual</i>	-0.006 5 (-0.49)	0.002 2 (0.62)	-0.007 1 (-0.67)
<i>Top1</i>	-0.000 6 (-0.81)	-0.000 5** (-2.17)	-0.000 5 (-0.81)
<i>Growth</i>	0.100 3*** (7.45)	-0.008 6*** (-3.43)	0.101 8*** (14.33)
<i>Mgshare</i>	-0.007 6** (-2.22)	0.000 9 (1.05)	-0.007 7*** (-3.08)
<i>Finance</i>	0.000 1 (0.35)	0.000 1 (0.82)	0.003 6 (0.85)
<i>Fdi</i>	-1.437 2 (-0.67)	-0.085 4 (-0.17)	-2.017 8 (-1.06)
行业	Yes	Yes	Yes
年份	Yes	Yes	Yes
<i>_cons</i>	1.443 2*** (2.89)	0.226 8* (1.88)	1.380 4*** (4.21)
N	9 808	9 808	9 808
<i>Adj. R²</i>	0.140 2	0.058 3	0.142 5

变量 IV1、IV2 系数分别为 0.223 2、0.034 5,且在 1%水平上显著,验证了工具变量相关性假定,与预期一致。第 4 列为第二阶段结果,数字经济的系数为 0.017 2,且在 1%水平上显著,说明在缓解内生性后,本文的结论依然成立,即数字经济显著正向影响企业战略差异度。

五、进一步研究

分析可知,数字经济发展有效影响企业战略差异度。那么,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战略差异度作用是否受其他因素影响。本文从地区发展、行业环境与企业内部资源三个方面分析了数字经济与企业战略差异度在不同情境下的作用效果。并将企业所处地区划分为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将环境不确定性与企业冗余资源作为行业环境、企业内部资源的代理变量进行探究。

(一) 区域异质性

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发展布局、人力资本以及基础设施等的差异,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也呈现出不平衡特征。那么,数字经济对企业战略差异度影响是否可能会因所处地区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基于此,本文将样本企业所在地划分为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进行区域异质性检验^①。表 7 的回归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有效促进企业战略差异度上升,相比较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对东部地区企业战略差异度的促进作用更明显。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东部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较早,数字经济水平较高,更能促进企业战略差异度上升。此外,东部地区人力资源、高技术企业聚集,为数字经济作用发挥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表 6 稳健性检验

变量	(1) SC	(2) Sc	(3) Dige	(4) SC
<i>Dige</i>	0.009 5*** (2.70)	0.008 2*** (3.03)		0.017 2*** (3.52)
IV1			0.223 2*** (8.85)	
IV2			0.034 5*** (2.80)	
<i>Size</i>	-0.043 0*** (-2.60)	-0.046 9*** (-3.43)	-0.053 7 (-1.47)	-0.045 2*** (-12.12)
<i>Lev</i>	0.378 0*** (5.78)	0.289 4*** (5.68)	-0.228 5* (-1.75)	0.280 3*** (9.99)
<i>Idpro</i>	0.048 5 (0.42)	0.018 5 (0.19)	0.625 5* (1.68)	0.020 6 (0.36)
<i>Board</i>	-0.000 5 (-0.09)	-0.000 6 (-0.15)	0.031 8** (2.12)	-0.005 6*** (-2.58)
<i>Age</i>	-0.045 0 (-1.23)	-0.034 4 (-0.97)	0.179 0* (1.66)	0.002 4*** (3.82)
<i>Dual</i>	-0.003 9 (-0.30)	0.001 2 (0.13)	0.004 6 (0.12)	0.007 1 (1.10)
<i>Top1</i>	-0.000 6 (-0.89)	-0.001 3** (-2.12)	0.002 6 (1.07)	-0.001 0*** (-5.06)
<i>Growth</i>	0.098 8*** (8.07)	0.120 9*** (11.19)	0.049 2** (2.13)	0.123 4*** (8.87)
<i>Mgshare</i>	-0.007 4** (-2.26)	-0.003 3 (-1.28)	0.007 8 (0.78)	-0.003 7*** (-3.43)
<i>Finance</i>	0.004 4 (1.31)	0.010 2*** (3.25)	-0.119 4*** (-11.57)	-0.008 0* (-1.69)
<i>Fdi</i>	-1.782 9 (-0.82)	-3.391 9* (-1.88)	26.672 7*** (5.37)	-0.106 4 (-0.09)
<i>Tang</i>	0.132 5* (1.67)			
<i>Popu</i>	-0.004 1 (-0.31)			
<i>Scedu</i>	0.000 1 (0.47)			
行业	Yes	Yes	Yes	Yes
年份	Yes	Yes	Yes	Yes
<i>_cons</i>	1.521 0*** (2.57)	1.281 5** (2.40)	-5.506 7*** (-3.44)	1.184 2*** (13.87)
N	9 804	10 717	10 222	10 222
<i>Adj. R²</i>	0.149 3	0.137 1	0.353 5	0.139 6

^① 根据国家统计局关于制度及分类标准进行经济地带的划分,具体参考:[http://www. stats. gov. cn/](http://www.stats.gov.cn/),最后访问日期:2023 年 4 月 4 日。

(二)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企业发展压力不仅来自于内部经营状况,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也在无形中施加压力。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会增加企业竞争压力,外部管理要素可控性下降会影响到企业经营活动,进而影响企业战略差异度。在此行业环境下,企业将被动进行变革、谋求发展。因此,环境不确定性对数字经济发展与企业战略差异度二者关系可能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本文借鉴申慧慧等的做法,^[26]运用企业过去五年的销售收入数据,通过计算且剔除行业效应,得到环境不确定性指数(Eu)。在表8第2列中, Eu * Dige的系数为0.2931,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环境不确定性对数字经济和企业战略差异度之间的影响是正向调节作用。具体而言,企业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越高,越能强化数字经济对企业战略差异度的正向影响。

表7 区域异质性回归结果分析

变量	东部地区	中西部地区
	SC	SC
<i>Dige</i>	0.0074** (2.00)	0.0135* (1.85)
<i>Size</i>	-0.0515*** (-5.13)	-0.1012*** (-4.06)
<i>Lev</i>	0.3027*** (8.19)	0.5477*** (5.37)
<i>Idpro</i>	-0.0251 (-0.21)	0.0501 (0.28)
<i>Board</i>	0.0032 (0.65)	-0.0046 (-0.61)
<i>Age</i>	-0.0426*** (-2.60)	-0.0291 (-1.03)
<i>Dual</i>	-0.0080 (-0.69)	0.0051 (0.24)
<i>Top1</i>	-0.0007 (-0.94)	-0.0016 (-1.31)
<i>Growth</i>	0.1043*** (12.90)	0.1088*** (5.71)
<i>Mgshare</i>	-0.0080*** (-2.83)	-0.0033 (-0.67)
<i>Finance</i>	0.0076* (1.65)	0.0119** (2.09)
<i>Fdi</i>	-3.8409** (-2.02)	-3.0187 (-1.01)
行业	Yes	Yes
年份	Yes	Yes
_cons	1.8524*** (5.17)	1.5614*** (2.13)
N	7149	3680
Adj. R ²	0.1676	0.1254

表8 环境不确定性与冗余资源的调节作用分析

变量	(1)	(2)	(3)
	SC	SC	SC
<i>Dige</i>	0.0102** (2.26)	0.0038* (1.91)	0.0057** (2.11)
<i>Eu * Dige</i>		0.2931*** (41.20)	
<i>Slack * Dige</i>			0.4734*** (27.51)
<i>Size</i>	-0.0879*** (-4.07)	-0.0100 (-1.01)	-0.0462*** (-3.35)
<i>Lev</i>	0.4825*** (5.74)	0.0772** (2.26)	0.6781*** (9.60)
<i>Idpro</i>	-0.0047 (-0.03)	-0.0119 (-0.15)	-0.0793 (-0.87)
<i>Board</i>	0.0002 (0.04)	-0.0021 (-0.75)	-0.0014 (-0.33)
<i>Age</i>	-0.0587 (-1.26)	0.0032 (0.42)	-0.0430* (-1.79)
<i>Dual</i>	-0.0040 (-0.28)	0.0065 (0.89)	0.0077 (0.71)
<i>Top1</i>	-0.0011 (-1.22)	-0.0000 (-0.03)	-0.0010 (-1.64)
<i>Growth</i>	0.1196*** (7.65)	-0.0265*** (-2.89)	0.0547*** (6.17)
<i>Mgshare</i>	-0.0040 (-1.11)	-0.0047** (-2.30)	-0.0009 (-0.38)
<i>Finance</i>	0.0075* (1.67)	0.0023 (1.08)	0.0029 (0.98)
<i>Fdi</i>	-3.6929 (-1.32)	-0.9941 (-0.75)	-1.8198 (-1.00)
行业	Yes	Yes	Yes
年份	Yes	Yes	Yes
_cons	2.3216*** (2.98)	0.5432** (2.08)	1.2528*** (2.74)
N	8183	8183	8183
Adj. R ²	0.1399	0.7137	0.6345

(三) 冗余资源的调节作用

企业资源配置会影响战略差异度结果,企业资源之间的差异性也代表着企业战略调整基础条件的不同,^[27]同时企业战略调整也需要资源支持。因此,企业冗余资源对数字经济与企业战略差异度之间关系可能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企业拥有冗余资源越多,企业可以调配用于战略调整的资源也就越多,能够帮助企业实施战略调整。本文借鉴宋铁波等的做法,^[28]将冗余资源分为未沉淀冗余、沉淀冗余以及潜在冗余资源。具体衡量方法如下:

$$\text{未沉淀冗余资源} = \text{流动资产} / \text{流动负债}, \quad (5)$$

$$\text{沉淀冗余资源} = (\text{管理费用} + \text{销售费用}) / \text{营业收入}, \quad (6)$$

$$\text{潜在冗余资源} = \text{所有者权益} / \text{负债}。 \quad (7)$$

冗余资源(Slack)用未沉淀冗余资源、沉淀冗余资源、潜在冗余资源三者的平均值来衡量。表8第3列显示 Slack * Dige 的系数为 0.473 4 且在 1%水平上显著,说明企业存在的冗余资源对数字经济和企业战略差异度之间的影响是正向调节作用,证明了本文前面的推断。

六、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立足于数字经济发展环境,讨论了数字经济对企业战略差异度的影响。基于中国 2011—2020 年沪深 A 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数据,多维度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战略差异度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结论表明,数字经济指数在各城市之间的差距较大,表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存在区域不平衡情况。从总样本来看,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企业战略差异度越大。从分样本来看,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呈现不平衡特征,相比较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对企业战略差异的正向影响在东部地区表现的更为显著,这主要是因为该地区人力资源集聚、信息基础设施可以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有力保障,有利于数字经济作用发挥。本文从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和行业市场竞争分析了数字经济对企业战略差异度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通过加剧市场竞争、提升企业风险承担能力促进企业战略差异度提升。进一步研究显示,环境不确定性和企业冗余资源在数字经济对企业战略差异度的影响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本文为证明数字经济发展可促进企业战略差异度提升这一论断提供了有力证据,也为企业不断调整战略来适应数字经济发展冲击以及外部环境变化、进而增强自身实力与竞争力提供了实践启示。第一,数字经济时代,企业所面临的内部条件与外部环境均发生了巨大变化,企业可以将业务等模块与互联网经济相结合,促进企业实现跨界经营。不仅如此,企业还应当跟随数字经济趋势,结合自身实际进行战略调整,让企业有效适应内外部环境变化,提升企业绩效。第二,由于环境不确定性与企业冗余资源对数字经济与企业战略差异度之间关系具有显著调节作用,企业在实施战略调整过程中,需注意环境不确定性与企业冗余资源情况。环境不确定性会加剧企业战略调整意图,实现企业健康持续发展,而企业冗余资源则是实施战略行为的基础,企业应用好这两个因素。第三,大力推进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所说,“要抓住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赋予的机遇”。政府需要发挥“有为政府”作用,利用财政资金加快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创造良好设施基础。第四,充分发挥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实施有效的外部监督。面对数字经济大发展大繁荣环境,政府需强化监督管理,抑制行业垄断行为,避免企业为迎合数字经济发展而盲目投资、草率调整战略的现象。第五,面对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这一现实,各地区需结合自身发展状况,制定“个性化”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另外,上级政府对于中西部地区需要给予更多政策倾斜,推进中西部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发展不平衡局面。

参考文献:

- [1] 赵涛,张智,梁上坤.数字经济、创业活跃度与高质量发展——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20,36(10).
- [2] 胡艳,王艺源,唐睿.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J].统计与决策,2021,37(17):15-19.

- [3] 刘海建. 企业组织结构的刚性特征及对战略变革的影响[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07(3):126-132.
- [4] 刘军, 杨渊懿, 张三峰. 中国数字经济测度与驱动因素研究[J]. 上海经济研究, 2020(6).
- [5] 董静, 邓浩然, 赵国振. CEO超额薪酬与战略变革——基于行为代理理论的研究[J]. 经济管理, 2020, 42(10):137-155.
- [6] 盛宇华, 朱赛林. 独立董事对企业战略变革的影响研究——基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视角[J]. 软科学, 2021, 35(2):60-66.
- [7] 韵江, 宁鑫, 暴莹. CEO过度自信与战略变革——基于“韧性效应”和“创造效应”的研究[J]. 南开管理评论, 2022, 25(5):180-190+214+191-192.
- [8] BEDNAR M K, BOIVIE S, PRINCE N R. Burr under the saddle: How media coverage influences strategic change[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13(2):910-925.
- [9] YANG Y, WANG F L, CHEN S. How strategy changes in different monetary policy conditions[J]. Chinese management studies, 2019(3):355-384.
- [10] 王霞, 叶彤彤. 国家治理变迁与企业战略变革——CEO权力与开放性特征的调节效应[J]. 科研管理, 2019, 40(12):234-242.
- [11] 么玉洁, 陈晓文. 进口贸易、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J]. 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3(6):73-83.
- [12] 盛明泉, 项春艳, 谢睿.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抑制实体企业“脱实向虚”[J].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22, 24(1):96-112.
- [13] 陈胜蓝, 吕丹, 刘玮娜. 激烈竞争下的公司捐赠:“慈善行为”抑或“战略行为”——来自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的经验证据[J]. 证券市场导报, 2014(5):34-39.
- [14] 刘志彪, 姜付秀, 卢二坡. 资本结构与产品市场竞争强度[J]. 经济研究, 2003(7):60-67+91.
- [15] 马凌远, 李晓敏. 科技金融政策促进了地区创新水平提升吗?——基于“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的准自然实验[J]. 中国软科学, 2019(12):30-42.
- [16] 郭峰, 王靖一, 王芳, 等. 测度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编制与空间特征[J]. 经济学(季刊), 2020, 19(4):1401-1418.
- [17] ZHANG Y, RAJAGOPALAN N. Once an outsider, always an outsider? CEO origin, strategic change, and firm performance[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0(3):334-346.
- [18] 叶康涛, 董雪雁, 崔倚菁. 企业战略定位与会计盈余管理行为选择[J]. 会计研究, 2015(10):23-29+96.
- [19] 黄群慧, 余泳泽, 张松林. 互联网发展与制造业生产率提升:内在机制与中国经验[J]. 中国工业经济, 2019(8).
- [20] 余明桂, 李文贵, 潘红波. 民营化、产权保护与企业风险承担[J]. 经济研究, 2013, 48(9):112-124.
- [21] 宋建波, 文雯, 王德宏. 海归高管能促进企业风险承担吗——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财贸经济, 2017, 38(12):111-126.
- [22] 杜善重, 李卓. 家族认同与企业战略变革——来自中国家族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当代财经, 2021(9):78-91.
- [23] 温忠麟, 叶宝娟. 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和模型发展[J]. 心理科学进展, 2014, 22(5):731-745.
- [24] 盛明泉, 任侨, 王文兵. 激励机制错位矫正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研究[J]. 管理学报, 2021, 18(6):843-852.
- [25] NUNN N, QIAN N. US food aid and civil conflict[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4(6):1630-1666.
- [26] 申慧慧, 于鹏, 吴联生. 国有股权、环境不确定性与投资效率[J]. 经济研究, 2012, 47(7):113-126.
- [27] ZAJAC E J, KRAATZ M S, BRESSER R K F. Modeling the dynamics of strategic fit: A normative approach to strategic change[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0(4):429-453.
- [28] 宋铁波, 钟熙, 陈伟宏. 谁在“穷则思变”? 基于中国民营与国有上市公司的对比分析[J]. 管理评论, 2019, 31(2):214-224.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Convergence of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of Qingdao Residents

ZHAO Jinkai, ZHANG Yongmei, YAN Qing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and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Shandong 266590, China)

Abstract: The entropy method is used to calculate the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index of Qingdao residents from 2016 to 2020, and the Dagum Gini coefficient and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 are used to analyze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spatial convergence of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of Qingdao residents. In terms of regional differences, inter-regional differences are the main source of the overall differences, and the intra-regional differences are expanding, while the intra-regional synergies are weak. In terms of convergence, there is no sigma convergence in Qingdao as a whole, but it shows beta convergence. The speed of conditional convergence is accelerated after the inclusion of control variables such as education development, social security, employment status and medical and health status. Therefore, to address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in Qingdao, it is supposed to combine the governance with the policies and strengthen the feasibility construction of the poor as the main task. Meanwhile,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general education are expected to coordinate, and a characteristic medical security system should be constructed to incorporate the health of Qingdao residents into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governance. The above measures will provide an approach to realize the rational and efficient governance of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of Qingdao residents.

Key words: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temporal evolution; regional differences; spatial convergence

(责任编辑:魏 霄)

(上接第 67 页)

Digit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rporate Strategic Deviance

SHENG Mingquan¹, XIANG Chunyan²

(School of Accountancy,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ngbu, Anhui 23303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mpact of digital economic development on corporate strategic deviance from the outside corporate environment and the inside corporate capability.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data from A-share non-financial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11 to 2020 shows that the higher digital economy develops, the greater the corporate strategic deviance becomes. Digit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an stimulate fierce competition among industries, enhance the capability of enterprise to bear risks, and promote the increase of corporate strategic deviance. Further research shows that 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 and redundant resources have a positive regul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economy and corporate strategic deviance, and digital economy has a stronger promoting effect on corporate strategic deviance in the eastern region. In the future, enterprises can integrate their business with Internet economy to promote their cross-border operation.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strategic adjustment, enterprises also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 and redundant resources. On the other hand, the government should take active measures to use financial funds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net infrastructure, create a sound environment for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and give full play to its role of the “visible hand” to strengthen its supervision and regulation.

Key words: digital economy; strategic deviance; industry market competition; enterprise risk bearing

(责任编辑:魏 霄)